

一、高祖武德九年（626）

九月，突厥頡利獻馬三千匹，羊萬口；上不受，但詔歸提掠中國戶口，徵溫彥溫還朝。

丁未，上引諸衛將卒習射於顯德殿，諭之曰：「戎狄侵盜，自古有之，患在邊境少安，則人主逸遊忘戰，是以寇來莫之能禦。今朕不使汝曹穿池築苑，專習弓矢，閒居無事，則為汝師，突厥入寇，則為汝將，庶幾中國之民可以少安矣！」於是日引數百人教射於殿庭，上親臨試，中多者賞以弓、刀、帛，其將帥亦加上考。群臣多諫曰：「於律，以兵刃至御在所者絞。今使卑碎之人張弓挾矢於軒陛之側，陛下親在其間，萬一有狂夫竊發，出於不意，非所以重社稷也。」韓州刺史封同人詐乘驛馬入朝切諫。上皆不聽，曰：「王者視四海如一家，封域之內，皆朕赤子，朕一一推心置其腹中，奈何宿衛之士亦加猜忌乎！」由是人思自勵，悉為精銳。

（一）這段文字的主旨，是朝政中關於何者的討論？

（A）軍事與君道（B）軍事與臣道（C）政治與君道（D）政治與臣道

（二）文字中的「上」、「朕」，指何人？何以知之？

（三）大臣勸諫的主要理由為何？

（四）封同人「詐乘驛馬」，何以未受重罰？

二、太宗貞觀十年（637）

夏，四月，己卯，（甲）上疏，以為：「人主善始者多，克終者寡，豈取之易而守之難乎？蓋以殷憂則竭誠以盡下，安逸則驕恣而輕物；盡下則胡越同心，輕物則六親離德，雖震之以威怒，亦皆貌從而心不服故也。人主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，將興繕則思知止，處高危則思謙降，臨滿盈則思挹損，遇逸樂則思撙節，在宴安則思後患，防壅蔽則思延納，疾讒邪則思正己，行爵賞則思因喜而僭，施刑罰則思因怒而濫，兼是十思，而選賢任能，固可以無為而治，又何必勞神苦體以代百司之哉！」

（一）這段文字，從體例與主旨上看，應屬大臣：

（A）報告施政（B）批評國君

（C）勸諫國君（D）商討大政

（二）文字中的（甲），應為何人？何以知之？

（三）提出這段文字的人，心中的當朝天子，是一位怎樣的君主？

（四）這段文字的「十思」之中，你認為較難理解的是哪幾項？你認為較難做到的是哪幾項？

三、唐太宗貞觀之治的根本原因----取材自范文瀾《中國通史簡編》

唐太宗的「貞觀之治」是國史上的美談，比之其前的「文景之治」、「明章之治」與之後的「開元之治」，不祇是未遑多讓，甚至更為後人稱誦。貞觀年間治世的出現，當然與太宗的表現有著密切的關係，但太宗諸多作為之中，何者可說是治世的「根本原因」？雖說或有仁智之見的不同看法，我們也可以看看范文瀾是怎麼看的。

唐太宗登帝位，唐朝才開始盛大起來。

隋朝是唐太宗的一面寶鑒。隋朝的盛衰興亡，給他深刻的印象。特別是農民大起義，使這個出身大貴族的雄豪子弟，不得不在事實前面，認識了勞動民眾的巨大威力。得罪了民眾，就象隋煬帝那樣集全部權力于一身的皇帝，也難逃亡國殺身的后果。他認識到要鞏固自己的統治權，就必須不得罪民眾，這是他取得貞觀之治的根本原因，也是被稱為英明的封建皇帝的根本原因。

唐太宗對朝臣們說，「人君依靠國家，國家依靠民眾，刻剝民眾來奉養人君，好比割身上的肉來充腹，腹飽了身也就斃命，君富了國也就滅亡。所以人君的災禍，不是從外面來，總是由自己造成的。大抵人君嗜欲太盛就要多費財物，多費財物就要加重賦稅，加重賦稅民眾就要愁苦，民眾愁苦國家就要危殆，國危了人君那得不喪亡。我經常想這個道理，所以不敢縱欲。」又說，「我在朝廷上，要說一句話，總得思考再三，怕說錯了害民，因此不敢多說話。」晚年立子李治（唐高宗）為太子，隨事訓誨，如見太子吃飯，說，「你知道耕種的艱難，你就常常有飯吃。」如見騎馬，說「你知道馬的勞逸，不用盡它的力氣，你就常常能騎它。」如見乘船，說「水可以載船，也可以覆船，民眾好比水，人君好比船。」一個封建統治者不可能超越這樣的觀點去認識民眾，能夠有這樣的觀點，也就是難得的封建統治者。他懂得人君與民眾相互間的關係，在即位的初年，曾和朝臣們討論如何治民。他說，「在大戰亂以後，教化怕不容易見效。」魏徵說，「不然。民眾遭受戰亂的痛苦，教化正容易見效。譬如給饑人做飯，給渴人飲水，是不很費力的事。」封德彝反對魏徵，說，「三代以下，人心愈來愈澆薄，所以秦朝專用法律，漢朝雜用霸道，它們是想教化而不能，不是能教化而不想。」魏徵駁斥說，「如果說古人淳樸，后世愈來愈澆薄，那末，澆薄到今天，人早化成鬼怪，還要什麼人君來治理！」唐太宗贊同魏徵的意見，定出「偃武修文，中國既安，四夷自服」的方針，專心從改善政治，使百姓安寧方面來著手。

1. 撰者在這段文字中，認定唐太宗貞觀之治的根本原因，應是：

(A)用賢 (B)納諫 (C)愛民 (D)守法

2. 撰者在這段文字中的論述，採用的「策略」，或是著重的「方法」，是什麼？請略言之，你認為效果如何？

3. 文本中述及魏徵與封德彝的辯論，此一辯論各自主張的重點為何？屬於統治上的哪兩種不同的主張？